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JINDAI YILAI RIBEN DE ZHONGGUOGUAN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杨栋梁 主编

第四卷 (1895—1945)

王美平 宋志勇 著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JINDAI YILAI RIBEN DE ZHONGGUOGUAN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杨栋梁 主编

第四卷 (1895—1945)

王美平 宋志勇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4卷, 1895—1945/王美平, 宋志勇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5

(凤凰文库. 历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8156-8

I. ①近… II. ①王… ②宋… III. ①汉学—历史—日本—1895~1945②对华政策—研究—日本—1895~1945 IV. ①K207.8②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8841 号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杨栋梁 主编

第四卷(1895—1945)

王美平 宋志勇 著

策 划 编 辑 王保顶

责 任 编 辑 张晓薇

装 帧 设 计 黄 炜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页 4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8156-8

定 价 3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前 言

近代日本何以发动侵华战争,这是国人在战争年代就开始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问题。此前,有人从日本的皇国观念、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传统入手,追根溯源地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有人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认为日本明治时期确定的扩张型国家战略必然导致其发动侵华战争;有人从近代化角度入手,认为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国家所残留的封建主义、军国主义余毒,是其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有人从国家机制角度入手,认为天皇制国体导致军部专权独大,缺乏有效的牵制势力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亦有人从国际环境与经济要素角度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必然性。近年来,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日本的对华观问题,并发表了相关论著,但在研究的深度上尚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日本对华认识的对象包罗万象,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俗、国民性等诸多领域。对于日本对华观原本难以一言以蔽之,但鉴于甲午战争是日本的对华观从古代的“慕华观”转为近代“蔑华观”的分水岭,此后日本的对华观与其他阶段相比,具有形成“中国亡国观”这一显著特征,故本书拟以“中国亡国观”的产生、发展、变化和实施为线索展开

论述,揭示日本发动十五年战争的认识基础和思想根源。

所谓“中国亡国观”是指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根据中国的内部状况及列强围绕中国展开的竞争局势而逐步形成的对华基本判断与认识。具体而言,中国经济落后、政治专制、军事孱弱、吏治腐败、社会动乱,边疆危机四伏、内地分崩离析,国家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处于单靠本国力量无法自立生存的状态。这样的中国在东亚格局中丧失了甲午战争前曾占据过的“竞争对手”的地位与实力;在国际政治中亦无资格被视为需要平等对待的合作伙伴,而只是一个可以被无视感情与主体性的侵略对象;在世界经济中由于国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绝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故而是列强激烈竞争的舞台;在中日关系中,则是应该服从日本领导和“旨意”的从属国。总之,中国失去了主体性,而只是可以被任意对待、处置乃至侵略的客体对象。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中国不断深化的民族危机中逐步形成、巩固了“中国亡国观”,对于中国面临亡国危机先后掀起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救亡图存的改革与革命运动,日本政界、军界乃至知识界的主流对其积极意义均予否定,甚至以表象为据反向理解各种革新运动会促使中国更为迅速地走向分裂与崩溃,坚持“中国亡国观”。由于持有此种认识的主体或直接位于决策地位制定政策,或处于决策周边提出议案,或置身于驻华使馆及军事机构提供相关情报,或活跃于言论界主导舆论,故上述对华认识通过各种渠道融入日本对华战略及决策的制度框架。当观念被嵌入制度却又缺乏“新陈代谢”时,就会规定政策的方向,并排斥其他的政策选择^①。因此,甲午战争后日本逐步形成的“中国亡国观”,是导致其在近代不断推行侵华政策、进而发动十五年战争的认识根源与思想鸦片。

^① 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基欧汉编,刘东国、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另一方面,日本侵华行动的屡次得逞,刺激了其侵华欲望的膨胀,这反过来限制了日本准确认识中国的能力。近代以来,日本出兵台湾、吞并琉球、侵略朝鲜、挑起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发动日俄战争夺取东北、参加一战抢夺山东权益,日本对华屡次出手屡次得逞,每一次得逞都更进一步刺激了其对华野心。这种对华野心的极度膨胀,严重地限制了日本认识中国的能力,导致其在观察中国问题时,往往捕捉表象,目光静态短小,致使其“中国亡国观”无法得到根本修正,最终发动了十五年战争,给中国及其他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当然,近代日本的对华观并非仅有一种,其对华政策亦有和平合作、协调扩张与武力扩张等不同流派,其中也有人发出了不同于“中国亡国观”的声音,但毕竟只是支流,未能主导近代日本的对华决策。鉴于篇幅有限,本书对之有所取舍,舍弃部分留待今后继续研究。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中国亡国观”的雏形——走上侵华之路 1

- 一 世界文明中心观的转移与甲午战争的发动 1
- 二 日本对华观的全民性逆转 16
- 三 “东洋盟主观”的形成与《马关条约》的签订 26
- 四 “中国亡国观”的雏形 36

第二章 “中国亡国观”的形成——“入欧侵亚” 42

- 一 “三国干涉”与“东洋盟主”意识的受挫 42
- 二 列强对中国经济权益的竞争与“中国亡国观” 45
- 三 对列强瓜分中国的认识与福建省的“不割让” 49
- 四 “入欧侵亚”路线的统一 60

第三章 “中国亡国观”的巩固——与列强“共舞” 76

- 一 日本政府的义和团观与出兵决策 76
- 二 民间的初期认识及其煽战舆论 91
- 三 战争过程中的中国观察 97
- 四 《辛丑条约》的签订与“中国亡国观”内涵的拓展 120

第四章 “中国亡国观”的升级——“大陆政策”的强化 131

- 一 日俄战后民众的自我观与对华观 132
- 二 “中国客体观”与“大陆政策”的强化 145

第五章 “中国亡国观”的“应验”——分裂“满蒙” 164

- 一 日本政界的辛亥革命观及对策 165
- 二 大陆浪人的辛亥革命观 187
- 三 知识分子的辛亥革命观 212

第六章 “中国亡国观”的变动——走向十五年战争 232

- 一 币原外交背后的北伐观 233
- 二 田中外交背后的北伐观 250
- 三 “满蒙领有论”与皇姑屯事件 268

第七章 “中国亡国观”的实践——灭亡中国的梦魇 275

- 一 对华认识与“九·一八”事变 275
- 二 对华认识与东亚“门罗主义” 287
- 三 走向侵略战争的对华认识与行动 299
- 四 蔑视中国与“七七事变” 306
- 五 《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的中国认识及其影响 313
- 六 “大东亚新秩序”的梦魇与中国 325

后记 342

第一章 “中国亡国观”的雏形—— 走上侵华之路

甲午战争是决定近代中日两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对日本形成蔑视型对华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是世界的对华观和对日观发生逆转的重要标志。此后，中日两国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日本由东亚一隅之小国上升为东亚头号强国并迅速膨胀为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却从亚洲大国地位沦为列强竞相瓜分侵略的对象，近代化进程遭到严重的打击和挫折。

那么，近代日本为何敢于发动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后日本何以对人口和国土资源均数倍于己的中国不断地采取蚕食、侵略政策？对于上述问题，国内已经从国家战略、政治状况、军事实力、经济水平、文化特点等视角进行了全面、翔实而又深入的研究，但在诸多研究中，鲜有从日本的对华观视角进行探究者。本章拟通过援引日文报刊、政党党报、从军日志及相关著作等资料，梳理、探究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逆转过程及其对侵华政策的影响。

一 世界文明中心观的转移与甲午战争的发动

甲午战争之近因，固然在于日本对于亚洲近邻的侵略野心及对东亚

传统秩序的挑战,但若考察其远因,则日本的世界文明中心观从中国转向西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步入近代以前,中国在东亚范围内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辐射、影响周边邻国,建立了以王道思想为基础、朝贡册封为形式的华夷秩序。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虽在政治体面及民族心理上不甘于属国或边缘国地位,制造出“神国观念”和“小中华思想”抗衡中国,不断追求对华平等乃至优越地位,甚至两次发起挑战引起大规模战争,却始终无法撼动中国的中心地位,也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因文明差距决定的中日间“师生关系”,在文化上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亦构成近代以前日本对华观的主线。

17世纪初,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在江户幕府前期,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朱子学成为官学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藤原星窝、林罗山等一代大儒的出现,意味着儒学在日本进入全盛期,也标志着日本对中华文明的推崇达到极点。其时,日本对中国的基本认识是,“中夏(中华)乃天地之中心”,“中华乃世界之师。对日本尤为大功之国。礼乐、书数、衣服、舟车、农具、武具、医药、针灸、官职、位阶、军法、武艺,乃至其他诸种工艺技术,无不源于中华,无不习于中华”。^①对此,经世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0)颇多感慨,“开国(建立江户幕府)以来,除支那书籍外别无它书。熟读之而领会其意,开见识成国风,纵然知支那之外有他国,亦皆以为夷国,无圣人之道”^②。

然而,进入德川中后期,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渗透,知识界开始对一向尊崇的儒学及中华文明表示质疑。日本朱子学自身的分化、仰慕西方科学技术的兰学和旨在脱中国化的国学的兴起,撼动了古来中华文明在日本唯我独尊的根基。居于主流位置的仰慕型

① 伊东多三郎编:《日本的名著 11 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东京:中央公论社,1976年,第333、332页。

② 佐藤昌介编:《日本的名著 25 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东京: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420页。

对华观受到了平视乃至蔑视型对华观的挑战。

朱子学虽然在德川前期被树为正统,但儒学的其他分支阳明学派和古学派亦同时存在并极力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解释世界。古学派学者则不受朱子学约束,主张回到孔孟经典中掌握儒学的本意,并认为日本比中国更好地传承了儒学。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1669年)中,首次称日本为“中国”而中国为“外邦”,并特别强调了日本皇统“万世一系”,而“外朝”“王朝更替凡三十回”,“臣下诛戮国王者二十五回”。^①山崎的弟子浅见纲斋也对尊华贬日的思想大加批判,他在《中国辨》中写道:“中国、夷狄之名在儒书中传来久矣。夫吾国有儒书盛行,读儒书者,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哀叹生于夷狄。……可悲之至也。夫尝天包于地外,无地不抱天者。然则有土地风俗之处,便各为一分天下,相无尊卑贵贱之分。”山崎在《靖献遗言讲义》中则呼吁,日本应以本国为中国,以“唐”为夷狄,而不应反其道而行之^②。不难发现,在山鹿和浅见的这些言论中,日本优越的“小中华思想”已初见端倪。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始自“西学东渐”并导致兰学在日本的兴起。兰学家们通过与荷兰通商的窗口接触到西方文明,并在吸吮、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和日本在科学技术乃至思想意识方面已落后于西方,仰慕中华的思想发生动摇。司马江汉(1747—1818)认为“支那及我日本无穷理(科学、哲学)之学”^③,渡边华山(1793—1841)指出重视教学和政治二道的西洋已“为唐山所不及”^④。前野良泽(1723—1803)援用西方的天文地理学知识批判了儒家的宇宙观,认为较之中国的“阴阳五行说”,由地、水、火、空四要素构成的西方“四元说”更能说明

① 田原嗣郎编:《山鹿素行与士道》,《日本的名著 12 山鹿素行》,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第18页。

② 冈田武彦编:《日本的思想家 6 山崎暗斋》,东京:明德出版社,1985年,第114—116页。

③ 司马江汉:《春波楼笔记》,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戸期の开明思想》,东京:社会评论社,1990年,第16页。

④ 渡边华山:《慎机论》,《日本的名著 25 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第117页。

宇宙原理,即“夫地,乃太虚之一点也,其形为圆如玉,故称地球”^①,从而用西方的地圆说否定了中国的地方说。前野还指出:“佛教所及唯‘亚细亚’之内,不过世界十分之二,而儒教所及不过十分之一。余者大凡天主教,其蔓延遍及各大洲。”^②以此强调世界文化多元并存,反对独尊儒术。佐久间象山注意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优于东方,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主张^③。杉田玄白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家宣扬的圣人之道,认为:“道者,非支那圣人所立,天地之道也。”“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稍闻东洋二三国之事,便以支那为万国之冠,又稍读其书,漫言夷狄之俗原无礼乐。夫以礼乐文物,分尊卑也。何国无尊卑,何国无礼乐。……即使衣冠文物可明尊卑之分,亦未必以支那为是,从风土则宜。”“夫地者一大球,万国布居于此。居之处皆中也。无国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④显然,杉田的用意不仅要否定传统的华夷论(中华文明中心论),而且要把儒学中树立的圣人以及圣人之道相对化。

德川中后期兴起的国学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竭力神化日本,贬低和排斥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对古来日本一贯仰慕的中华文明采取了一种轻蔑的态度。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复古神道学者,通过对日本最古老的书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神话的重释,刻意编造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日本神学体系,其基本说教是:日本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缔造的神国,人种是天神所造的神孙,天照大神将天丛云剑、八咫琼曲玉、八咫镜三种神器委于其子孙天皇,万世一系统治天下。故日本既是“神国”,也是君权神授的“皇国”。不仅如此,日

① 清水教好:《华夷思想与19世纪》,子安宣邦等编:《江戸的思想7》,鹤鹑社,1997年11月,第121页。

② 前野良泽:《管蠡秘言》,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戸期の开明思想》,第42页。

③ 《日本思想史大系55 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第413页。

④ 杉田玄白:《狂医之言》,《日本思想史大系64 洋学上》,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第228—230页。

本因是“普照四海万国之天照大神出生之本国，故为万国原本大宗之御国，万事优于异国”^①，而“日本天子实际上是统治四海万国之真天子”^②，进而为日本称霸世界、统治全人类制造根据。

对此，本居宣长特别强调了天皇万世一系而中国王朝不断更替的区别，试图以此来否定中国的正统性。他说：“皇祖天照大神所出之国，优于万国而著。……诸国无不受此大神之恩惠者。”“皇位随天地同在，早定于此。”^③相比之下，中国并无定主，“人心不善，习俗淫乱，但夺国权，贱者亦可为君”。由此他得出中国所谓的“圣人”不过是“灭君、夺国之祸首”。^④故日本是有“道”之国，而中国无“道”，儒家亦无“道”。据此，本居呼吁日本人不要再沉迷于儒学，“欲习道者，须先将汉意、儒心清洗干净，坚守大和魂甚为紧要”。^⑤

本居的弟子、皇国史观的鼻祖平田笃胤，不仅鼓吹日本是神国，而且要把日本变成取代中国的“中华”。他讥讽中国对周边民族“尝以戎狄、夷狄相称而鄙之如禽兽，然其全国皆为夷狄所夺。如斯大国之民，竟垂首敬待尝鄙之为北狄者为君”^⑥。他认为，既然蛮族统治下的清王朝失去了“中华”的资格，那么有史以来从未遭受异族统治、天皇“万世一系”且继承了古来中华文明的日本，就有资格成为中华。

幕末的吉田松阴则继承和发展了德川中后期出现的“海外雄飞论”，极力鼓吹对外扩张。他在《幽囚录》中写道，日本的大害来自华盛顿和俄国，且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包围日本。为摆脱这种困境，日本应主动出击攻略他国。即：“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衰。故善保国者，

① 本居宣长语。石川淳编：《本居宣长全集》第8卷，东京：筑摩书房，1972年，第311页。

② 平田笃胤语。《新修平田笃胤全集》第6卷，东京：名著出版，1977年，第543页。

③ 本居宣长：《直毘灵》，《日本的名著21 本居宣长》，东京：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69页。

④ 同上书，第170页。

⑤ 同上书，第35—36页。

⑥ 平田笃胤：《古道大意》，相良亨编：《日本的名著24 平田笃胤》，东京：中央公论社，1988年，第152页。

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应急固武备,充实舰炮,开垦虾夷而封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琉球参观、集会如内地诸侯。又责朝鲜纳贡如昔,北取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固守边境,则可谓善保国矣。”^①无独有偶,岛津齐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也呼吁,日本应实施外向型战略,“及早获取福州及台湾、朝鲜乃日本强大之最佳良策”^②。自不待言,幕末的日本自顾不暇,侵略中国尚属无稽之谈。但“海外雄飞论”不仅为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日本对华观的逆转埋下了祸根。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第二次冲击是“西力东渐”。中国两次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意味着日本古来效仿之楷模的坍塌,日本政界及精英阶层的“慕华观”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便对清朝的堕落甚为惊讶,认为英、法攻陷北京,清帝远逃,而后缔结城下之盟,“实乃甚不知耻也”。慨叹中国“已病入膏肓,难以疗治,殊至割地、乞和,则无药可救”^③。高岛秋帆(1798—1866)在《天保上书》中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指出英国“与唐国相比,土地颇为偏小,又兼远征,极为不利。然却如斯大胆袭来,以至唐国大败,英方无一死亡,其趣全在平生所持之武备”。反过来,他“嘲笑唐国之炮术如同儿戏”。^④横井小楠则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政教风俗不如人,即中国“乃亚细亚洲中一大邦,古往大圣相继勃兴,文物领先于万国,故将未开化之草昧外国分为九夷八蛮,施以怀柔之政。以降,主愚暗而失贤明,世代多革命,却自称中华域,待外国为蛮夷与古无异”,然而“道光末年,鸦片之乱始为英国挫败,不得不立亲之和约。……彼屈大义而怖兵威,折良港沃土以偿违约之罪,极其屈辱,然朝廷仍优柔寡断,无惩戒反省之念”。^⑤

① 吉田松阴:《幽囚录》,《日本的名著 31 吉田松阴》,东京:中央公论社,1989年,第227页。

②③ 岛津齐彬:《齐彬公史料》,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戸期の开明思想》,第193页。

④ 高岛秋帆:《天保上书》,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戸期の开明思想》,第172—173页。

⑤ 横井小楠:《国是三论》,松浦玲编:《日本的名著 30 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东京:中央公论社,1987年,第319—320页。

在以中国为鉴的呼声中,1862—1867年,幕府四次派遣“千岁丸”访问上海,这是德川幕府成立二百余年来日本人首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国土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看到地广人多、历史悠久的中国,外有列强压迫,内有太平军造反,清朝确已国势衰微、四面楚歌。高杉晋作在《游清五录》中写道:“观上海形势,支那人悉为外国人所役使。英法之人步行街头,清人皆让道而避之。上海名属支那,实为英法属地。”在相关的访清游记中,可大量看到中国懒惰、懦弱、散漫、不卫生、政纪废弛的记述,中国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急剧降低^①。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派遣的岩仓使节团对欧美十二国进行了一年零十个月的考察后,对日本、中国乃至整个东洋的落后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使节团注意到:欧美各国之所以在煤铁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和航海业取得巨大进步^②,就在于“西洋一令一法,皆考虑人民财产生计,以保护人民为主旨……此乃保其富强之所在”^③。“西方人注重实学,东方人笃信玄学”。西方人设草木禽兽园,搜集各国古今货币等是“为使学识广博……能促进实学,发现对工商业之实益,以成富庶之媒介”,兴办教育是为“培养殖富之本源,而使国家兴盛崛起”;东方则“耻于研究一草一木”,“所学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则浮华之词藻,与民生切实相关之事业,则被视为琐碎小事,而绝不用心于此”。^④使节团副使伊藤博文感叹道:“欧美各国之政制、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盖超绝于我东洋”,决心“将此开明之风移入我国,促使我国民速至同等开化之域”。^⑤

由此看来,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在与西方的接触中,确认了欧美的“强势地位”和“文明形象”,同时也确认了日本和中国的“弱势地位”和“愚昧品行”,从而在认识上不仅完成了自我否定,也完成了对中华文明

① 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

② 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第29页。

③ 久米邦武:《美欧回览实记》第1卷,第112—113页。

④ 同上书,第82页。

⑤ 春敝公追颂会:《伊藤博文传》上,东京:统正社,1944年,第638页。